

希腊史

无论谁来到希腊，都会有回到故乡的感觉

[英] 乔治·格罗特 —— 著
晏绍祥 陈思伟 —— 译
晏绍祥 —— 审校

(上册)

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

A History of
GREECE

希腊史

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

(上册)

[英] 乔治·格罗特 —— 著

晏绍祥 陈思伟 —— 译

晏绍祥 —— 审校

译者序言

19 世纪英国的社会变革与希腊主义

从 18 世纪后期到 19 世纪前期，希腊主义逐渐在西欧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工业革命造就了英国的世界霸权，也让英国在向近代社会转型中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工业资产阶级掌握着英国的大部分财富，却没有资格参与政权；工人阶级是劳动的主力军，却只能居住在贫民窟中，受到残酷的剥削，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大部分人生活状况恶劣，几乎没有政治权利可言；手工业者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气息奄奄，掀起了反抗工厂的运动；环境污染严重。吉尔伯特·海埃特如此抨击当时英国自然环

境的恶劣：“空中黑烟笼罩；空气中夹杂着工厂喷出的浓雾，以及机器的咆哮与刺耳的噪声；不到几年光景，迷人的山谷变成了庞大的贫民窟；清静的荒野被开发；葱绿的草地被埋在了裸露的矿渣下……那时建造的成千上万的、让人恶心的城镇和建筑，砖质教堂，以及魔鬼般的黑糊糊的工厂，至今仍在伤害着我们的眼睛。”〔1〕

但工业革命深刻影响了英国的政治和社会构造。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殖民扩张的成功，以及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让英国成为 19 世纪欧洲最有条件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资产阶级不断发出要求改革国会、参与政权的呼声。经过 1832 年、1867 年和 1884—1885 年的三次国会改革，资产阶级参政的愿望逐步得到实现。工人阶级通过组织工会和社会主义运动，连续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和反抗，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到 19 世纪末，

〔1〕 Gilbert Highet,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 pp. 437-438.

这些要求至少得到了部分实现，其政治影响也有了较大的提升。1867年和1884—1885年的改革，让英国几乎所有的成年男性获得了选举权，奠定了普选权的基础。妇女的选举权，至少从密尔开始，不断被人提起。总体上看，英国政治虽然缓慢但稳步地迈向民主。

正是在这种进步和问题并存的时代，希腊主义逐渐在英国兴起。18世纪中后期斯图尔特和内维特两人的雅典之行，还有他们对希腊的考察和随后出版的《雅典的古迹》，让英国人第一次领略到了真正的希腊风格。他们对爱奥尼亚式和多利亚式建筑的推崇，在英国设计的希腊式建筑，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19世纪初厄尔金勋爵将帕特农神庙上的浮雕运回希腊，后辗转成为不列颠博物馆的藏品，让人们见识到古典希腊的真正雕刻，在英国掀起一阵希腊热。19世纪20年代希腊独立战争的爆发，以及拜伦、雪莱等英国诗人的参与，他们对希腊独立战争的报道和关注，也刺激了人们对希腊的热情。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的英国，兴起了一股前往希腊参观和考察的热潮。“希腊的吸引力

在于新奇；它近得足以让人们到达，但远得又足以让人们感到是异乡，某种程度的危险，还给冒险增加了调料。对业余爱好者协会来说，它还提供了另一个机会：虽然辉格党的寡头制政治上无法攻击，但它们在美学上容易遭到抨击。只要人们知道希腊的艺术是怎么回事，就可以用其来推翻寡头们青睐的巴拉丁风格。”^{〔1〕}于是在 19 世纪上半期的英国，不管是诗歌，还是艺术、建筑、历史，都纷纷转向希腊，甚至英国的服装和妇女的发型，都受到希腊风气的影响。

促使人们转向希腊的第一个原因，是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发现当时英国与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有诸多相似之处。当时的著名学者阿诺德评论道，“与较早的古代比较，两个时代都是‘现代的’。战争的消失、生活舒适度的增加，闲暇时追求高雅的大量机会，是两个‘现代’的共同特征。最重要的是，两个‘现代’都表现出‘人类理智上的成熟；以批判精神观察事

〔1〕 Richard Jenkyns, *The Victorians and Ancient Greece*, p. 4.

实的倾向；寻找规律而非随意浏览；根据理性规则而不是任性或偏见进行判断’。”但是，与雅典比较，“现代的”英国有许多不足，“政治改革、宗教宽容、商业繁荣本身变成了目的，付出的代价是忽视了其他方面——人性中比较高尚的方面”，雅典人的作品“能够帮助我们医治在我看来智力上的严重缺陷”。即当时英国人各方面的粗俗。因此，他相当欣赏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认为它们体现了那个时代生活和思想的丰满。^[1]雪莱、拜伦等诗人，也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希腊理想美的爱戴，尽管他们心目中的希腊，像阿诺德的希腊一样，很大程度上来自18世纪末德国思想家和诗人的描绘，“革命的年代里，希腊和意大利以及希腊罗马世界让人们感到是一个逃避地。它们是美丽的国度，是音乐、热情、充满温暖的南方。那里有太阳、山脉、蔚蓝的大海、湛蓝的天空，还有果树和爱笑的姑娘。它们意味着

[1] Frank Turner, *The Greek Heritages in Victorian Britain*, pp. 18-29. 引文见第18、22、27页。

对阴冷的北方的逃避。”^{〔1〕}海埃特这话虽然针对的是革命年代，但从历史实际来说，似乎更适合 19 世纪。

促使希腊主义在英国兴起的另一因素，是 19 世纪英国政治的不断民主化。随着历史研究的发展，当时的英国人已经认识到，斯巴达和罗马都并非真正的民主政治，古代的民主政治模板只能是雅典。因此，保守派如米特福德等人，总是把雅典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但是，也正是他们对雅典民主的批评，引起了希望在英国推进民主的激进派对希腊民主制度的关注，并迫使他们认真研究古代历史。

19 世纪 20 年代，马考莱、格罗特、密尔等人在《爱丁堡评论》《骑士季刊》等刊物上对保守派的希腊史解释发起批评。马考莱抱怨说，以前的人写希腊史时，完全忽视了那个时代人性的特点，或者把人描写为神灵，或者描写为魔鬼，出现这种情况的

〔1〕 Gilbert Highet,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 p. 365.

原因，“不是因为人们没有更好的方法发现真相，而是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方式发现错误”〔1〕。把修昔底德、色诺芬、普鲁塔克等一众古典作家的描写当成了真相，可是，这些人中，有些没有亲自参加过战斗，有些根本不知自由为何物。但是，他们的故事非常生动，由此误导了近代学者。马考莱认为，米特福德的著作有自己的长处，就是相信当时人的记述，对于后人的记述，凡与同时代人记载矛盾的，一律抛弃。可是这种合理的怀疑，却受到其政治偏见的破坏，“米特福德先生从来不放过任何机会向我们证实，它（民主政治）是一种罪恶。事实上，一个好的政府，就像一件好的外套一样，适合它为之设计的身体。一个基于抽象的原则，宣称某种政府是好的，却对那种政府治理的人民缺乏准确的知识，其判断之荒谬，犹如一个裁缝总是根据贝尔维多的阿波罗来给他所有顾客裁衣一样。”〔2〕

〔1〕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On Mitford's History of Greece*, p. 287.

〔2〕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On Mitford's History of Greece*, p. 289.

19 世纪英国思想文化界中，功利主义学派影响巨大。该学派以边沁、密尔父子、格罗特等为代表，强调人们自己的利益只有自己最为清楚，因此，最好的政治，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最大多数人能够获益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政治因其包容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功利主义哲学家的推崇，爱屋及乌之余，古代的民主政治，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也得到功利主义者的肯定，其中表现最明显的是密尔。他受过非常好的古典学教育，3 岁开始学习希腊语，8 岁学习拉丁语，12 岁时阅读古典文献，翻译过柏拉图的若干重要对话集，并写有评论；格罗特《希腊史》出版后，他曾撰写长篇评论，开头的一段话至今仍经常被人们征引：

对希腊史的兴趣没有枯竭，也不会枯竭。作为纯粹的故事，真正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可与之竞争。它的人物、它的形势以及那些事件的进程本身，都是史诗般的。那是一篇英雄的史诗，其人物是那些民族。对我们

了解如此之多的历史，那也是对如今仍活着的我们而言具有最深远影响的。欧洲民族的真正祖先，不是他们因之获得血肉之躯的那些人，而是他们因之获得最丰富遗产的那些人。马拉松战役，即使作为英国历史上的事件，甚至都比哈斯丁斯战役重要。如果那天的结果不同的话，布雷顿人和撒克逊人或许还在丛林中游荡。^{〔1〕}

希腊文明所以重要，是因为雅典重要：

虽然希腊历史充满让人感兴趣的事物，但都为雅典笼罩。无论希腊人拥有多少后人应当感激的最大优点，雅典人都将之推到极致。如果历史上的希腊民族是进步的主要来源和最突出的代表，雅典可以在希腊享有同样尊严的地位，因为希腊所有的进步因素，就其最高成就而言，都集

〔1〕 John Stuart Mill, *Collected Works*, vol. xi, p. 307.

中在那个神奇的城市。^{〔1〕}

为雅典民主辩护

在 19 世纪上半期的英国，格罗特是最有资格撰写新风格希腊史的人选。他的祖父本是德国新教徒，1731 年移居伦敦，后开办银行，其父接续祖父事业，继续扩大业务，家资丰厚。格罗特在当时伦敦最好的学校之一查特豪斯公学接受基础教育。像当时英国大多数此类学校一样，课程除英文外，基本为古典学占据。格罗特在那里接触到维吉尔、贺拉斯和荷马等古典作家。不过在完成基础教育后，格罗特就承父命在银行开始工作。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学习，坚持阅读古典作家的作品，同时研读詹姆斯·密尔、西斯蒙第、莱辛、贝克莱、康德、休谟、亚当·斯密、萨伊等人的政治经济学、哲学著述。老密尔关于批判地处理资料的主

〔1〕 John Stuart Mill, *Collected Works*, vol. xi, p. 315.

张，格罗特肯定印象深刻。在古典语言之外，他自学了法语和德语。德国学者的史料批判方法、神话研究，他都非常熟悉。格罗特曾与詹姆斯·密尔有长期交往，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边沁等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积极参与当时英国激进派发起的议会改革运动，直接促成了1832年英国国会的第一次改革。1833年，格罗特当选为国会下院议员，并且和密尔等一道，继续为推进国会改革努力。对实际政治的参与，让格罗特对政治生活的实际运转有了深切体会。

格罗特的《希腊史》出版之前，已经有部分学者开始对18世纪以来希腊史领域中的保守倾向进行批评，其中最有分量的是瑟尔沃尔。他的《希腊史》为8卷，1835年开始出版。他有意为雅典民主辩护，承认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民领袖的作用，并且认为雅典人不乏怜悯和仁慈。他是第一个将德国古典学术的巨大成就引入希腊史领域的英国史学家，广泛阅读过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有高度的批判标准。

格罗特从20年代初开始为撰写《希腊史》做准备，写有若

千篇笔记。这些笔记的基本看法，是反击对古代民主的不利评论，认为雅典民主政治并未压迫富人，如果民主政治存在不足，那是它不够激进，没有废除所有的财产和家庭地位的差别。^{〔1〕} 1826 年，他借评论克林顿《希腊史编年》的机会，亮出了自己关于希腊史的基本看法。他认为，希腊人在古典时代所取得的成就，给个人才能的发展创造的机会，是后来两千年中很少达到的。“它的制度给予个人才能的发展以无与伦比的刺激，是既不容否认、也不容怀疑的事实。”^{〔2〕} 可能从那时开始，他已经准备重写古代希腊历史。19 世纪 40 年代他陆续退出政治和银行业务，全力以赴撰写《希腊史》。1846 年，该书第 1 卷出版。在之后的 10 年中，他陆续出版了之后的 11 卷，对希腊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特别是雅典民主政治，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

格罗特的第一个贡献，是重新确定了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

〔1〕 Kyriacos N. Demetriou, *George Grote on Plato and Athenian Democracy: A Study in Classical Reception*, pp. 26-27.

〔2〕 ‘Review on FastiHellenici’, *Westminster Review*, 5(April, 1826), p. 270.

分期，将克里斯提尼改革作为雅典民主政治建立的标志，并详细追溯了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 5 世纪的发展。其次，他逐一反驳了对雅典民主政治不够稳定、政治领袖都是煽动分子、雅典民众朝令夕改、对领袖薄德寡恩、民众法庭不遵守法律等指控。第三，为雅典的扩张政策，特别是雅典帝国辩护，对雅典的对外政策提出一系列新的解释。最后，是对智者派和苏格拉底问题的新解释。

格罗特之前，几乎所有希腊史著作都沿用亚里士多德或者普鲁塔克等的看法，认为梭伦改革创立了雅典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导致了僭主政治，并以此为基准评价梭伦的改革，抨击民主政治。但是，格罗特肯定梭伦将第四等级公民吸收入公民大会和创立 400 人议事会的措施，但对他将公民划分为 4 个等级、并据此分配政治权利、扩大战神山议事会权力的做法，颇有微词，认为梭伦创立的是希腊人称之为荣誉政体的政府（timocracy）；他否认梭伦创立陪审法庭的传统，认为那是公元前 5 世纪伯里克利时代改革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考察有关事实，我们会发现，

与伯里克利时代比较，梭伦所创立的，不过是雅典民主政治一个赤裸的基础。”国家权力很大程度上仍留在少数寡头分子手中。正因为梭伦政体没有让人民充分参与政治，才导致了其政体的不稳定和后来的僭主政治。也就是说，通过剥夺梭伦创立民主政治的资格，格罗特把雅典僭主政治兴起的责任推给了寡头政治。

克里斯提尼改革则得到他的高度肯定，“他（克里斯提尼）与人民的联合催生了雅典民主，那是一场真正且重要的革命。”^{〔1〕}经过改革，雅典全体自由民都被登记成为公民；梭伦原有的大部分制度被保存，但组成和性质都有了变化；十将军创立，削弱了军事执政官的权威；陪审法庭形成，开始掌管雅典司法；陶片放逐法则以温和手段保卫着新生的民主政治。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雅典民主政治初步形成。通过新生的公民大会，雅典人“习惯于既做演说者，也做听众。每个人，因为感到他对决定施加了影响，将他自己的安全和幸福与多数人的决定相认同，并熟悉了他既不

〔1〕 George Grote, *History of Greece*, p. 76.

能也不应抗拒的主权的观念。这是个对雅典人新奇的观念。与它同时产生的，是对言论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神圣化……以及全共同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情感，这种情感尽管不能取代地方性的和地区性的特殊，但总是占据主导地位”^{〔1〕}。也就是说，在全体人民获得对国家的统治权之后，他们与国家之间再无任何阻隔，爱国情感油然而生，成为雅典后来政治稳定与强大的基础。他的主张，正与其 1831 年呼吁进行英国议会改革、以树立英国公民对国家认同的小册子如出一辙。^{〔2〕}随后，格罗特对新生的民主政治的基本特性进行了归纳：

这就是最初的雅典民主政治。它的产生，既是作为对希皮亚斯及其王朝的反应，也是克里斯提尼和无公民权的大众之间值得纪念的合作——不管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

〔1〕 George Grote, *History of Greece*, p. 85.

〔2〕 Frank M. Turner, *The Greek Heritage in Victorian Britain*, p. 220.